

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关于非洲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综述

周慕红

我国学术界对非洲华侨华人问题进行较多的研究,大致始于本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除很少几篇学术论文外,仅限于新闻报道。此后,即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首先,在有关非洲华侨华人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编纂工作上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方积根的《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该书于1986年出版,是《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资料丛书》的组成部分。此外,近几年来,还出版了一些关于非洲华侨华人问题的大型工具书,譬如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周南京教授主编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大洋洲与非洲卷)》等。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对非洲华侨华人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较为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并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较1980年前有了明显的进展。这主要集中在下述两个方面:

一、关于近代契约华工问题

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南部非洲、西印度洋诸岛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扎伊尔)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南非契约华工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重点,研究比较集中。研究内容包括契约华工输入非洲的原因、方式、规模、来源、性质、结果和历史分期等等。主要研究论文有彭家礼的《清末英国为南非金矿招募华工始

末》(载于《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以下简称《始末》),艾周昌的《近代华工在南非》(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许永璋的《近现代时期南非的华工和华侨》(载《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和《毛里求斯的华工与华侨》(载《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1月第33卷第1期),以及余建华的《近代契约华工输入西印度洋诸岛探析》(载《西亚非洲》1991年第1期,以下简称《探析》)。

关于华工输入非洲的起因,我国学者针对南非的情况提出大体相同的看法。彭家礼在《始末》中指出,掳掠契约华工,是英国政府为了满足殖民地金矿财团解决金矿劳动力危机的需要。他认为布尔战争后,伦敦货币市场利润下降使大量资金流向海外,并集中于南非钻石和黄金产地特兰士瓦尔和奥兰治自由邦。1902~1904年兰德金矿出现了危机:工资高,成本大,劳力不足,产量和利润下降以及资金外移。南非金矿财团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力短缺,彭家礼认为这种危机是金矿财团自身造成的。金矿财团雇佣土著劳工,为追求高额利润大幅度削减工资并实行各矿统一招工,“使土著工人宁愿在家乡打猎种地,甚至挨饿,也不愿到矿上做工”。使用黑奴“既费资金又不解决问题”。雇佣白人劳工不仅经济成本太高,而且政治上难以控制,甚至有可能动摇自己的统治。而华工“廉价、驯服、能干、供应正常又取之不尽”。因此,在比较土著劳工、黑奴、白人工人和华工的优劣利弊之后,想到大量招募华工。

艾周昌在《近代华工在南非》一文中也指出,向南非输入华工是为了补充当地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和满足垄断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的需要。他认为,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大量剿灭科伊桑人造成当地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这时期,南非除从爪哇、马达加斯加岛和安哥拉输入奴隶外,主要从亚洲输入,“其中也包括从印度尼西亚贩运去的中国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以张伯伦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招用华工,必能振兴矿利,挽回金矿的衰败局面。因此当英布战争后垄断资本家急于恢复和扩大金矿生产又苦于劳动力缺乏时,“决意招募华工”。同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也使他们迫切“需要使用工资更为低廉的劳动力”。

许永璋认为,华工之所以输入非洲还有清政府的原因。他在《近现代时期南非的华工和华侨》中指出,“清政府过去是禁止华工出洋的。后来考虑到统治地位的安全,……企图以华工出洋的办法,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同时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清政府对于外国来华招募工人,也只得听之任之了”。

余建华针对西印度洋诸岛的情况,提出输入华工是历史上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在《探析》一文中指出,第一种力量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资本的发展”。这使得西方“各国对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需求日益迫切”而“开始了资本输出”,加紧开发殖民地并掠夺殖民地资源。第二种力量是种植园的经济危机。奴隶制的废止使西印度洋诸岛的种植园经济由于严重缺乏劳动力而陷于瘫痪,“获得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成为西印度洋诸岛殖民当局及当地种植园主的当务之急”。第三种力量是19世纪初期我国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状况及不平等条约的影响。鸦片战争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所受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更为深重,自然经济瓦解,小农经济破产”,土地高度兼并,无业人口急剧增加,加

剧了原有的人多地少的矛盾,“导致人口大量外流”。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列强“得以以此为掩护,取得招工便利和特权,在我国沿海地区大量掠夺劳动力”。

关于华工输入非洲的方式,学者们一致认为暴力胁迫、掳掠和诱骗贩卖。彭家礼认为,英国政府和南非财团沆瀣一气,“通过驻外使节、官僚、政客、洋行、买办、代理商等中介人物和机构,收买人贩子、地痞、恶棍”;联合干起贩卖中国人为奴隶的罪恶勾当。首先,英国政府威胁利诱清政府签订出卖人口的《保工章程》,强迫华工签订《雇工合同》,使野蛮掳掠华工“合法化”。其次,英国政府同南非矿商分头在华进行大规模招工。“英国政府炮制法案和章程,进行谈判和签约”;“南非金矿财团组织庞大的招工机构,贿赂中国官府,深入内地任意掳掠良民”。招募华工,“名为招工,实际上仍是由洋行、买办、奸商、拐子层层立约包揽,辗转贩卖”。

余建华根据国内较早的有关“猪仔贸易”的文献《奥游小志》记载,法国学者多米尼克·迪朗和让·亨利的著作《留尼汪华侨史》、《北京条约》第五款内容以及英法招工史实认为,“19世纪60年代前后,西印度洋诸岛在华招工有非法与合法之分”。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当时清政府禁止移民出洋,“西印度洋诸岛从中国本土招募的契约华工,往往是殖民地种植园主的经纪人或苦力贩子勾结中国地方上的歹徒、流氓到附近乡村用各种卑鄙手段拐骗或绑架而来,是在暴力胁迫下强迫签订契约而成……”,“是非法的、暗地的招工”。19世纪60年代以后,侵华战争得逞使西方殖民者实现在华招工合法化。殖民者依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在华公开招工,疯狂掠夺我国人力资源。“1882年法国在上海为留尼汪招雇的2101名华工,便是援引它在《北京条约》中获得的权利进行的公开招募”。

关于华工输入非洲的规模,学者们对南非华工的统计有所不同。彭家礼根据英国议

会文件中有关特兰士瓦尔矿山劳工的往来文件、英国驻华领事馆商务报告、外务部南非招工档、保工局文档等一批原始档案、资料的对比分析,以及对当时华工被掳出国实际情况的考察,估计“被英方拐往南非的华工至少在7万人以上”。

艾周昌认为,总的来说,19世纪中贩运到南非的华工“人数不多,规模不大”。1904年英国政府同清廷签订了《保工章程》,标志着南非招募华工“由零散的、间接的贸易变成了官商勾结的大规模直接贸易”。“发生这个转变的决定因素是英国垄断资本集团的需要”。据统计,1904年招募华工2万余人,1905年为3.3万余人,1906年为1860人,三年总计当在5.5万人左右。

许永璋认为,在特兰士瓦尔的华工总数,1904年为9668人,1905年为39952人,1906年为51427人,1907年为49302人,1908年为21207人,1909年为6516人,1910年为305人,总计为178377人。

余建华对西印度洋诸岛的研究结果是,1760年法国首次从印度强行掳掠300户华人到毛里求斯,1829年英国一种植园主再次招募400名华工。19世纪30~40年代期间规模不大,每批100~300名左右,1840~1843年期间为高峰,共招募华工3000人,以后转入低潮,除1875年输入500名外,每年只吸收有限的人数。输入留尼汪的华工没有总计数字,但是,整个19世纪下半叶时常有大批华工从中国大陆直接招募到留尼汪,1882年有2101名契约华工从上海到留尼汪,1901年10月5日有808名。马达加斯加大规模输入华工共3次,共计4267人。

许永璋在《毛里求斯华工与华侨》一文中也讨论了毛里求斯华工的输入规模。虽然没有总计数字,但也谈到19世纪30~40年代,常有“整船的”中国工人从新加坡运到毛里求斯。他说,据统计,从1840年12月29日至1843年7月5日运到毛里求斯的契约华工,

共有2303人。他这个数据与余建华的略有不同。

关于华工的来源,虽然不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近来也有所涉及。余建华认为,毛里求斯的华工,1760年来源于印度班固尔的华人,1829年来源于东南亚的华人劳工,19世纪30~40年代来源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中国契约农工,1875年来源于上述两地的契约华工。此后,还有马六甲的劳工市场,有时也有从中国本土先到香港、新加坡再转到毛里求斯的大陆华人。许永璋认为华工来源于:1. 中国东南沿海的农民;2. 19世纪30~40年代期间每年定期运到新加坡和槟榔屿的华工;3. 留尼汪的期满契约华工;4. 19世纪末期的香港居民;5. 马六甲和加尔各答的中国劳工。

艾周昌认为,南非的华工,《保工章程》订立之前来源于香港、新加坡和马达加斯加转运的华工;签约之后招工“以天津为主,以烟台和广州为辅”。许永璋认为《保工章程》订立之后,招工起初少量在广东,后来大部分来自山东和直隶等地。彭家礼认为是天津、北京和山东。

关于华工输入非洲的性质,学者们一致认为是在非洲奴隶贸易的继续和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彭家礼指出,英国为兰德金矿招募契约华工只是20世纪初期英帝国主义全球性殖民扩张和资本输出等侵略活动中的“一段历史插曲”,是英国侵略者20多年来开发其海外殖民地“传统模式的继续”。南非金矿的中国劳工,名义上是根据同中国政府签订的招工章程条约“合法”招募的,“实际上比苦力贸易时期的非法掳掠更加野蛮”。1904~1908年英国政府为南非金矿招去的7万名契约华工,可以说是20世纪初“合法”掳掠和“契约奴隶制”的突出典型。

艾周昌指出,20世纪前英国贩运华工到南非是在“契约合同”形式下奴隶贸易的翻版。《保工章程》没有改变招募华工的变相奴

隶贸易性质,华工依然是这桩买卖中的“唯一商品”。

余建华认为,近代西印度洋诸岛输入契约华工,实质上是西方殖民者在“自由移民”的幌子下推行的“变相奴隶贸易”,是“非洲奴隶贸易的继续和翻版”。

关于华工输入非洲的结果,学者们的主导观点具有多重性。金矿垄断财团和中国买办获得高额利润,清政府参与分赃,垄断财团的奴役和剥削压迫最终激起华工的强烈反抗。正是华工的抗暴斗争终止了这桩罪恶交易和血腥勾当。这种观点以彭家礼的阐述和论证最具代表性。他指出,英国政府和南非金矿财团的“合法”掳掠以及清政府对人民的无耻出卖,使英国垄断资本集团及其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大发其财”,助纣为虐的“满大人”从中分得一杯羹,遭殃受害的是无辜的中国人民。他指出,在土著劳工、黑奴、华工和白人劳工中,华工工资最低,劳动强度最高。他特别指出,“降低工资,增强劳动强度,以及以华工顶替土著劳工,表面看来是以华工排斥土著劳工,实际上以低工资、高效率的契约华工为武器,挟制土著劳工,破坏土著劳工的合法斗争和反抗活动,使之就范,从而达到两种劳工兼用的目的”。他还根据史实证明华工在南非金矿不仅遭到无情奴役,而且受到残酷迫害。他指出,掳掠奴役的最终结果是激起华工声势浩大的抗暴斗争。这种斗争制止了英国政府和垄断财团迫害华工的血腥罪行。到1906年11月,英国政府停止在华招工。1910年3月华工全部被遣返回国。

艾周昌也认为,外国资本家和中国买办从买卖华工罪恶交易中“获得大量利润”。他根据南非特兰士瓦尔矿务局招工代理人裴雷在《保工章程》订立前后在天津、烟台和广州同英商洋行和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订立合同招工而使几方均获暴利的史实,以及开平矿务局在招募华工的第1~2年度“获利10万元”的史实证实了这个观点。他还根据华工的生

活条件、工种、工时、工资以及一系列剥夺政治权力和人身自由的规定认为,华工受到“残酷的剥削、非人的待遇和野蛮的种族歧视”,最终“迫使华工起而反抗”。

许永璋也根据南非华工的工时、最高及最低工资额度、第1~2年内的死亡和病例数量、各种处罚规定以及有关原始材料,认为华工“处境悲惨”,并根据1904~1906年期间华工罢工、暴动的史实和次数说明反抗斗争的频繁和激烈。他认为:“在华工反抗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20世纪初南非兰德地区的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于是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停止输入华工的问题”。

余建华认为,毛里求斯华人和华工由于不屈服于法国殖民者的胁迫和“不甘忍受种植园奴隶般的生活”而“纷纷起来反抗”,最终“由种植园主出资,政府将他们遣返”。留尼汪则是由于华工的繁重苦役和非人待遇传到国内,激起华工家属和群众的抗议活动,“要求清政府惩办诱拐华工出洋的主犯魏池,并设法营救在留尼汪的受难华工”而停止招工。马达加斯加第一批华工由于劳役繁重和生活条件恶劣以及疾病和死亡而“不愿再续契约……纷纷要求如期离马,有时还举行集体罢工”,结果期满全部返回。第二批除法国殖民者留下100名熟练工人外,其余400名全部遣返。第三批由于国内群众的抗议活动和华工的怠工而遣返。至此,近代该岛招募华工基本停止。

此外,余建华还探讨了西印度洋诸岛输入华工的历史分期问题。他认为大体上可分为“前后相贯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前期,输入中心是毛里求斯。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开端,输入中心是留尼汪。第三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世纪初叶,输入中心是马达加斯加”。并指出,毛里求斯是“最早开始招募华工的西印度洋殖民地”,留尼汪是“第一个直接从中国本土招工的殖民地”,马达加

斯加是“西印度洋三大岛中引进契约华工最晚”的殖民地。

二、关于非洲华侨华人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发表的论文和其他文章有:董悦华的《1910年以来的非洲华人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载《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前面提及的许永璋的《近现代时期南非的华工和华侨》《毛里求斯的华工和华侨》,方积根和胡文英合著的《非洲华侨历史与现状概述》(收入《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简称《概述》),方积根和李秀华合著的《马达加斯加华侨的历史与现状》(出处同《概述》),以及陈崇凯的《华人华工与近代的中非关系》(载《文史杂志》1990年第1期)。研究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华侨华人去非洲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和职业变化;宗教信仰、同祖国的关系及其对当地的作用。

关于华侨华人去非洲的情况,方积根和胡文英考察了古代、近代和现代时期华侨去非洲的年代、籍贯、主要路线、在非洲各国的分布和数量、早期谋生手段及以后的职业发展等内容,并对华侨去非洲做出一定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人去非洲的高潮时期,除19世纪初大批华工被掳出洋外,主要是国内军阀混战时期和抗战时期。主要原因在于:1.连年战乱,生活不安定;2.逃避抽壮丁;3.灾荒饥馑;4.广东沿海人民海外谋生的习惯和非洲的亲友关系。方积根和李秀华还考察了华人到马岛的历史和分布状况,探讨了华人到马岛的原因。许永璋考察了华侨去南非和毛里求斯的史实。

关于华侨华人经济和职业的变化,董悦华的主要观点是,“华人由单纯从事零售贸易和种植园经济向多种经济拓展,由小商人、小业主向多种职业发展,从无足轻重发展为侨居国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方积根、李秀华

根据马达加斯加华侨的具体情况,也表述了大体相同的看法,认为“早期来马的华侨,大多数从事小商、小贩、收购土特产、充当法商行和当地人的媒人。……经过多年艰苦经营,……华侨经济约占到当地经济的5%。……总的经济状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大富商和大种植园主是少数,大多数华侨经济状况比较优裕。”又指出,马国独立后实行国有化,侨商依然有利可图,但对今后的政局和外侨政策感到忧虑。

关于宗教信仰,董悦华认为,基督教在年轻一代华人中影响越来越大,“这必将导致华人进一步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日益西方化”。方积根和李秀华认为,马达加斯加华侨大多信奉天主教,老一代华侨还信奉关公和佛教,青年一代敬崇关帝的观念则已淡薄。

关于华侨华人同祖国的关系,以董悦华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非洲华人时刻关注着祖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竭尽全力支持祖国的进步事业”。同时,他也指出,老一辈华人不愿改变国籍的传统影响在华人中逐渐减弱,年轻一代更加重视现实和自己的未来,改变国籍是大势所趋,华人与当地人普遍通婚,逐渐融为一体。他还认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华人参与侨居国(地区)政治的意识逐渐加强,不仅关心选举权,而且积极参加议会竞选,甚至入阁执政。年轻一代参政意识尤为强烈。他们已不再局限于华人社会的狭小圈子,而要“把整个国家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大刀阔斧地施加自己的影响”。

关于华侨华人对当地的作用,学者们一致认为,在非洲历史上,无论是在近代还是现代,非洲华侨华人对所在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作者周慕红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